

■ 学人素描

王小鲁: 坚持独立思考 透视经济真相



○ 倪小林

我与王小鲁教授有一面之交,当时他是长安论坛的一次研讨会主持人,我是听众,他并不认识我。但是,我对他有关国民收入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很感兴趣。

当我面对面采访王小鲁时发现,他依然保持着谦谦君子的儒雅风度,但谈到他在过去的那些岁月中所参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故事时,他的观点非常鲜明,言语表达也很爽快。在整个采访过程中,他时而显得很随和,时而又表现得有些固执,他对自己所要坚持的东西很执着,让人觉得他做学问很纯粹,也许,这足以反映出一个人学者最难能可贵的学术禀性。

亲历中国改革的幸运参与者

王小鲁和同龄人一样,初中没读完就从北京到山西插队。要说和别人有些不一样,那就是在那个之余苦读苦写。他说过:自己呆的那个村子,年年都有逃荒要饭的人,粮食不够吃。这时你就会思考,国家的经济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?他尽可能搜罗了一些当时能够找到的书来读,希望从书中找答案。他白天和农民在一起干活,深入农民的生活,晚上读书,冥思苦想,写了很多读书笔记。

后来,他到一家铝厂当了一名工人,但读书仍然是他的嗜好。他回到北京后进了工厂,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会和王小鲁擦肩而过,只因他已经读了广办的“721工人大学”,不让再报考其他任何正规大学,从此失去了和别人一样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。可是,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意外变化。在工厂上大学时,他写的一篇文章被当时社科院内部刊物《未定稿》主编和同仁看上了,他们正在物色年轻的、有思想的研究人员。当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正是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。王小鲁很快被破格调入此刊物,工作是当编辑,自己也写文章。这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关键一步,说幸运还真的幸运,在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从工厂直接进入到国家级的科研机构,接触如此前

王小鲁现在在国民经济研究所从事宏观经济研究,在澳大利亚获得博士学位。他不仅亲历了早期中国经济改革,研究涉及农村包产到户、乡镇企业发展、沿海地区开放、国有企业改革等,而且他还是一个有独立学术见解的经济学家,对经济增长问题、粮食问题、地区发展和地区差距问题、国有企业改制、收入分配尤其是灰色收入和农村贫困等问题都做过深度研究,并提出了很多独特见解。他的坚信改革才能推进中国经济发展。

沿的各种思想,文章接连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。

《未定稿》之所以得名,是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它在那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独特位置。王小鲁回忆当时有很多解放思想的文章,都在这里相继发表过。此刊物存在时间虽然很短影响却很大。

正是从这里开始,王小鲁进入了高层政策的研究圈子。后来,他又进入新组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,做过《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》杂志主编。自1986年后,他担任体制改革发展研究室主任。他的研究范围紧贴着中国改革路径:农村包产到户、乡镇企业发展、沿海地区开放、深圳特区发展、国有企业改革等。他在介绍自己的经历之后,加上了一句话“我研究的内容很杂”。

王小鲁在改革初期担任了当时很有知名度的《走向未来》丛书编委会成员,他还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评议员,也是那些有见地的改革思路的坚定支持者。

1989年2月,他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,系统地攻读了经济学理论,并拿到了博士学位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海归”,这为后来在国民经济研究所主持项目研究打下了很好基础。8年以后,他回国后感到由衷地高兴,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改革真的已走出了一条市场化路子。

王小鲁有幸参与过中国初期的改革,而后又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训练,这使他觉得“自己做研究得心应手”。这就是王小鲁的人生经历,也反映了莘莘学子对国家发展、社会和民生问题报以拳拳之心的博大胸怀。

学术独立见解需要勇气与智慧

讲到回国做研究,王小鲁对樊纲教授的邀请仍记忆犹新。在1990年代,他在日本访问期间遇到樊纲,樊纲很热情地对他发出邀请:你干脆回国内到我研究所去做宏观经济学研究吧!确实,王小鲁早有回国准备,于是在1998年回到了国内,并进入国民经济研究所至今。他“学以致用”,全

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经济研究之中。

他将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法,用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焦点问题。他做过的一些主要课题有:经济增长问题、粮食问题、地区发展和地区差距问题、国有企业改制和非国有企业发展问题、城市化问题、收入分配问题、农村贫困问题等等。国民经济研究所创设了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,并每两年出一本书,今年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。

去年夏天是王小鲁与媒体打交道最频繁的一年,除了自己撰写文章外,他还在网络媒体和网友交谈一个话题:如何看待灰色收入。

“当时,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?”王小鲁与同仁在研究中发现,我国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是不完整的。根据2005年的统计显示,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%(这组人,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只有2.8万多元,但按当时汽车拥有量、高档住宅购买、居民银行存款等指标来看,这个数据显然是不真实的。王小鲁正是从怀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,他们发现,问题的关键是少数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灰色收入。

“这是一个早已存在的问题,收入问题说到底是个制度问题,现在人们都在说收入差距拉大,但是灰色收入却没有计入统计,数据失真真是必然的。只不过大家没有认真去深究。”王小鲁很“固执己见”,学者发现问题,研究上有突破,很多时候是因对数据或真相生疑而有所建树。王小鲁对于收入数据的怀疑,刺激他进行了深入研究。

研究人们的真实收入,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他和同仁一道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法进行调研和数据分析。他们调查的样本遍及全国27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,也覆盖了一批中小城市和县城。与此同时,他还依据家用汽车拥有量、商品住宅销售量、出国旅游人数、银行存款分布等数据分别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进行了推算,以对调查分析的结果进行多方面验证。这些结果互相之间有较高的一致性,以此来说明他们的估计结果是基本可信的。

尽管如此,他也一再说明,由于研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研究条件的限制,这项研究结果是初步的,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打下进一步验证。根据他们的估算,居民收入中约有4.8万亿没有包括在统计中。他称之为“隐性收入”,并认为这是导致实际收入差距更大的原因之一。这项研究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议论。

王小鲁在一次讲座上表示,隐性收入的大部分是灰色收入。这些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这五个渠道:公共资金流失、土地收益流失、金融腐败、行政管理中的寻租行为和垄断行业收入。他认为,造成这些问题不应该归罪于市场化,而是因为制度存在漏洞,这说明一些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到位。因此,他不断呼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变革来解决这些问题。

其实,王小鲁并非只感兴趣灰色收入,他除了一直关注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,也对经济发展问题、市场化问题等等做过很多研究,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,有不少受到决策层的关注。在中国做研究,有时候需要勇

气,有时候也需要智慧。在做研究时,或许王小鲁是“二者兼有”。

深化改革才能推进中国经济发展

我的采访大大超出了预计时间,当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。可是,我们才刚刚涉及到关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话题。

谈到改革与发展,王小鲁谈兴很浓。他说,“我们的研究表明,中国市场化程度的确越来越高,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,提升得更快。”

在说到改革推进了社会进步时,王小鲁的研究经历闪现了很多思想火花。在改革之初,他曾关注过农产品流通渠道问题,就有过一些突破性的建议。早在1981年,我国农村改革,正在逐步推开,许多地方开始搞“包产到户”,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刚刚萌发,可当时的流通体制依旧是“统购统销”。那年正赶上四川柑桔大丰收,当地政府规定只准供销社统一收购。当时地方政府还在公路和铁路设卡,禁

止私人收购柑桔外运,结果导致柑桔大批腐烂。得知这个消息,王小鲁与几位同事赶到柑桔主产区四川的江津、南充等地调查。

“四川柑桔流通问题”的调查报告出笼了,是由王小鲁执笔写成。在调查报告中,他们提出了要打破垄断,放开农村的流通渠道,这一建议直接挑战了当时的流通体制。

这些年来,王小鲁还一直在研究中国市场化问题,他们创设的中国市场化指数,看似技术性很强,其实从研究课题的内容不难看出,其中包含了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强烈关切。他在很多场合都表露过,“虽然我们的结论是市场化程度在提升,但我还是认为,中国经济中很多制度问题、机制问题,包括收入差距问题,在市场化过程中是难以自发得到解决的。解决这些问题,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”

最后,他用坚定的语气表达“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,只有依靠改革,坚持不懈的改革才能得以解决。”

■ 本期人物话语



货币政策从紧方针“不变”

易纲(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)2月24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会议上说,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将进一步暴露,国内也刚刚遭受了雨雪冰冻灾害,央行认真评估了上述“外忧”和“内忧”对中国投资、消费和进出口的影响,认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风险仍然是通货膨胀,既定的货币政策从紧方针并不会因国内外一些新情况的出现而改变。

■ 多声道

社保基金资产7年增6倍

戴相龙(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)2月28日在“2008养老金国际研讨会”上透露,2007年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为5100亿元,比上年增长58%,实现收益1100亿元,收益率高达38%,均创出历史最好成绩。社保基金成立7年来资产规模不断增加,由2001年底不足100亿美元到2007年底超过700亿美元,增加了6倍多;投资效益不断提高,成立以来年收益率超过11%。全国社保基金和一般投资机构一样,都要实现保值增值。但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还应坚持以下三项原则:一是奉行责任投资,二是坚持审慎投资和三是追求“和谐”投资。

中国上市银行总市值达到历史新高

蒋定之(中国银监会副主席)在近日中国银监会召开的2008年全国大型银行监管工作会议上指出,2007年大型银行经营业绩实现了新的跨越,上市银行总市值达到历史新高。一是上市银行总市值达到历史新高。截至2007年末,四家上市银行市值合计8288亿美元,比2006年末增长35%。其中,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市值分居世界第一、二、三位。二是资产总量达到历史新高。2007年末,五家银行总资产29万亿元,同比增长17%。三是盈利水平达到历史新高。四家股改银行资产回报率平均为1.11%,同比上升了0.23个百分点,达到英国《银行家》世界排名前十家银行的平均盈利水平。四是不良贷款降到历史新低。五是案件数量减少到历史新低。

欧盟将为主权基金出台自律守则

巴罗佐(欧盟委员会主席)2月25日表示,主权基金并不坏,它提供的是机会,正如眼下的金融市场动荡所表明的那样,主权基金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,因此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全球,都应该维护一个开放的投资环境。欧洲的投资基金都要在内部治理和信息披露方面严守规矩,因此欧盟不能允许外部的基金不遵守类似的规则。欧盟委员会定于27日出台具体政策建议,以寻求在欧盟层面上就主权基金形成统一立场,这一建议有待在3月中旬召开的欧盟春季峰会上提交各成员国首脑审议。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不会包括立法行动,而是要与主权基金所属国合作,在增进主权基金运作的透明度、可预见性和可归责性方面通过一套自愿的行为守则。

输入性通胀对中国物价上涨压力非常大

姚景源(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)2月26日出席在湖北襄樊举办的“2008年中部崛起国际合作论坛暨中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交流会”时表示,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,也取决于世界经济的走向,而国际原油价格高企、世界粮食储备减少,以及美元大幅贬值导致全球原料价格大幅上涨等,使2008年中国输入性通胀压力非常大。

■ 来自日内瓦

房价飞涨: 瑞士人也难圆购房梦

○ 徐千惠

距离日内瓦市最著名的商业街仅几步之遥,一栋办公楼内有一套公寓被拍卖。该公寓有130平方米面积,位于建于上世纪的建筑物顶层,从客厅窗口望出去可看到日内瓦最著名的喷泉及阿尔比斯山。

当地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后,吸引了700多人前来参观,挤爆了这栋办公楼的电梯。该套公寓的拍卖价由50万瑞郎一路涨到了150万瑞郎。据专家估计,最后成交价格可能会介于200万瑞郎至300万瑞郎之间。

看到这一新闻,笔者也感慨,如今的日内瓦房价的确也涨疯了。根据日内瓦房地产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报告,截至2006年末,日内瓦市约有1万个家庭在寻找或购买住房。从目前来看,日内瓦市住房购买的需求与供应比例为5:1。而日内瓦城市本来就不大,市中心也不允许建设超过8层楼高的建筑物。随着日内

瓦市的居住人口不断增加,房价也在过去两年内快速上涨。

假设一个普通家庭的每月收入为17000瑞郎,同时要支付250000瑞郎的购房首付资金(以20%首付标准计算)。在瑞士,拥有这样条件的家庭已属于生活比较舒服的中产阶层了。这类家庭一般会计划购买价值100万瑞郎左右的一套住房。当然,如果是购买公寓或别墅就要超过预算了。

他们在选择购房时会考虑一些因素。例如,一套四间卧室,有阳台或花园,住房的采光要好,又能看到一些风景,环境优美舒适,建筑材料优质,要是交通方便或靠近学校就更好了等。可以说,这是瑞士家庭的一个购房梦想。

那么,现实离他们的梦想有多远呢?

根据笔者的观察,在日内瓦的确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一些住房,但房价却远远超过了100万瑞郎,即便离日

内瓦市稍近一点的地方,也买不到一套价值150万瑞郎的宜居住房。许多家庭逐渐离开日内瓦市,并沿着日内瓦湖往洛桑方向寻找住房。其实,目前日内瓦市的附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住房紧张情况。由此,一些家庭只能搬到更远的地方,如日内瓦湖的另一端,或搬到日内瓦的边境(即法国境内)。

以笔者之见,如果购房预算为100万瑞郎的话,不如沿着日内瓦湖一带如洛桑地区,可以购买到一套面积为150平方米的公寓单元,且建房时间又晚很多。如果再往内陆走如Neuchatel(开车到日内瓦约1个多小时),那么100万瑞郎可以买到约220平方米的别墅了。

为此,专家们建议,日内瓦居民不要再犹豫了,搬到国外或洛桑去吧,尤其是具有城市发展潜力巨大的洛桑市。毕竟瑞士是很小的,从日内瓦湖的一端(Montreux)到另一端(日内瓦),也不过是一个小时车程。

■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

赵俪生与陈振汉: 中国经济史学两大名家

○ 梁捷

最近几个月,中国经济史学界接连失去了赵俪生和陈振汉两位先生。这两位老先生分属不同的学术流派,赵先生从史学入经济,陈先生则从经济入史学,各有极大成就。

赵俪生没有出国留学经历,也没有主持过什么大型国家课题,大半辈子呆在偏远的兰州大学,研究被认为“过时”的中国制度史。他研究的内容“太土”,所以很少为专业以外的读者所知。直到他的弟子近年来影响越来越大,人们才注意到有这样一位被边缘化多年的老前辈。

赵俪生生于1917年,从小就富有热情,中学时代投身于现代新文学运动,发表过不少白话诗。18岁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,参加过“左翼作家联盟”与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,在著名的“一二九”运动中是个活跃分子。抗战爆发后,赵俪生感到“历史学更深刻”,从此由文学步入史学大门,研究明末清初几位思想家思想。

抗战期间,赵俪生一直在西北做中学教员,因没有机会出国留学,便从中国古籍入手“道补”学问,在这点上,他与国学大师钱穆的治学路径颇有契合之处。后来,赵俪生在大学里也讲了很多年的“中国通史”。赵先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。王家范曾说,赵俪生堪称钱穆之后在大学里讲授“中国通史”最成功的学者。

赵俪生没有明确的师承,但他“转益多师是吾师”,他曾深情回忆过闻一多先生对他人格的影响,稽文甫先生对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影响,王献唐先生对他学习古文献有影响。赵俪生把这些老师的影响融合起来,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,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

1949年以后,他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,进入学术人生的高产期。他对“农民运动”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,1955年出版的《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》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。当时向达先生讲,解放后的中国新史学界有“五朵金花”,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、农民战争、土地制度、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、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。赵先生即是最活跃的人物之一,对五朵“金花”中的三朵都有贡献。

可惜,从1958年起,赵俪生被划为右派分子,被撤去教授头衔,发表文章的权利基本上被剥夺了达20年之久,直到1979年始获改正。改正以后,赵俪生任兰州大学教授,带出一批研究生,并继续20年前未完成的工作,出版了《中国土地制度史》等重要著作。

陈振汉教授则完全属于另一套学问系统,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博士,也是影响到1949年后中国经济学发展路径的学者之一。

陈振汉生于1912年,1928年以文科第一名考入杭州高级中学,次年考入南开大学预科,两年后毕业,直接升入由何廉与方显廷教授组建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。四年后,陈振汉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,入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,指导教师是阿希和熊彼得,陈振汉在很短时间里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,并在哈佛的《经济学季刊》(QJE,1941年,第LV卷,8月号)上发表了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,“美国棉纺织业成本和生产率的地区差异(1880-1910年)”。

陈振汉于1940年回到国内,应恩师何廉与方显廷之邀,就职于当时在重庆的南开经济研究所,后又兼任中央大学教授。抗战胜利以后,陈振汉回到北平,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。陈振汉的治学深受熊彼得思想影响,要求在经济史研究中体现出经济学家的理论水平和理论抽象能力,应该注重对历史统计资料的科学分析,一切理论论证也都应该有统计的基础支持。他的这种研究方式也大大影响到北大和南开的经济史研究风气。

解放时,陈振汉很坚决地留在了北京,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,开始选编《清实录》和《东华录》经济史资料。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期间,他还担任过《毛泽东选集》英译委员会委员,参加具体翻译工作。之后,他越来越少地讨论理论问题,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史料整理和汇编上。1955年,他的论文《明末清初(1620-1720年)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、地租和土地集中》产生过很大影响,成为当时明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。

1957年,陈振汉与徐毓麟、罗志如、巫宝三、宁嘉凤、谷春帆五位知名经济学家合作撰写《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》。身为此文的执笔者,陈振汉很快被划为极右分子。在十年浩劫中,他又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,1979年才恢复工作。

在他一生的最后20多年里,陈振汉继续努力整理《清实录》中的经济史料,并出版了《清实录经济史资料》第一辑(农业编),代表了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。

赵俪生和陈振汉这两位经济史名家的学术背景、治学方法截然不同,但都用实际行动表明对国家和学术的忠诚,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,遂归道山,令人唏嘘。